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英藏黑水城西夏文献
搜集整理及专题研究”(09BTQ018)成果

黑水城西夏文献研究

束锡红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3年·北京

目　录

绪　　论 / 1

一、西夏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 3

二、西夏文献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和需求 / 5

三、西夏文献学研究的实证要求与实践基础 / 7

四、本书的创新价值体现 / 10

第一章　西夏和黑水城简史 / 16

一、西夏王朝 / 16

二、黑水城 / 17

三、西夏文的重新发现和认识 / 19

四、“西夏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定义 / 21

第二章　黑水城及其他西夏文献的收藏 / 25

一、国内部分 / 25

二、国外部分 / 31

第三章　黑水城西夏文献及其他各部收藏的相互关系 / 37

一、俄藏西夏文献的两个获取地点 / 37

二、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来源和研究 / 38

三、英藏黑水城文献与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关系和比较 / 38

四、法藏西夏文文献与莫高窟北区文献的关系和比较 / 45

五、法藏西夏文文献和俄国、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关系 / 45

第四章　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举要 / 61

一、图书 / 61

二、社会文书 / 67
第五章 黑水城西夏佛教文献举要 / 104
一、宋朝“赐经”的佛典 / 104
二、翻译和刻印的佛典 / 105
三、对回鹘文化的兼收 / 120
四、对吐蕃文化的吸收 / 121
第六章 黑水城西夏佛教文献反映的教派特点 / 133
一、清凉国师和顺宗皇帝:华严教派的复兴 / 133
二、澄观一宗密体系:教禅合一的潮流 / 135
三、禅源诸诠集:禅学的兴盛 / 136
四、六祖坛经的版本:并非单一的敦煌本系统 / 137
五、西夏文献中的“禅藏”文献臆测 / 144
六、阿弥陀佛崇拜:净土的繁荣 / 146
七、上乐、时论、大黑天崇拜:密教的发展变化 / 148
第七章 黑水城西夏文献的版本学研究 / 156
一、纸质 / 156
二、印刷术 / 160
三、版本鉴别 / 166
四、版画 / 169
五、装帧 / 174
六、题记 / 176
第八章 西夏文献总目初编 / 188

附录一 黑水城艺术品与藏传佛教 / 221
附录二 英藏黑水城文献斯坦因编号和馆藏编号对照表 / 228
后记 站在贺兰山头远眺 / 330

绪　论

历史之书翻回公元1038年这一页时，在中国西北部有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势力宣布称王，自言“大夏”。这就是西夏王朝。西夏先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后与南宋、金鼎足而立，顽强地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化，并使这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小王朝成为了当时西北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仿佛一夜间烟消云散。

我的工作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所在地银川，就是昔日西夏王朝国都所在地。银川有着“塞上江南”之誉，其内在灵气也许正来自于它所秉承的西夏文明的生韵。为了揭开脚下这块神秘土地内在的文化密码，我们最先着手的是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黑水城西夏文献。

我们在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就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吴芳思女士进行了首次会谈。耳闻不如亲见，除了保持着英国人得体而矜持的礼仪风度外，吴芳思热情、直爽，不多几句就可知她既有原则又有决断，对我们的心情和愿望能够理解并支持。中国的西夏藏品现在由这样一位女士负责管理，倒也是幸运的。

闻名遐迩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着斯坦因于20世纪初从黑水城遗址等地盗运的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黑水城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兰库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之中。西夏王朝曾在此设置“黑水监军司”，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西夏宝义元年(1226)蒙古军攻破黑水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元代沿用西夏旧称，今额济纳旗的“额济纳”三字，实为“亦

集乃”之异写，其源仍为西夏语。黑水城因断流缺水，至此逐渐荒芜。经由近 700 年的岁月更迭，往日的烟火已然消散，只剩下高达九米的城墙孤独地承受塞北风沙年复一年的侵蚀，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也成云烟，只有那嶙峋的怪树林伴着风的呼啸。

凡流传有关宝藏传说的地方大多是探险家热衷的去处。寂静的黑水城迎来的首批“光顾者”是俄国的探险队。1907 年，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组织了以科兹洛夫为队长的蒙古四川探险队。1908—1909 年科兹洛夫来到了黑水城进行考察，当打开一座废弃了的佛塔后，他惊呼“我发现了巨大的博物馆”。科兹洛夫在黑水城进行了九天的挖掘，用骆驼驮走了 40 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文献。

黑水城的劫掠之灾并未就此结束。相较于科兹洛夫，英国东方学和考古学专家斯坦因更具备考古的专业素质和眼光。他的学术修养、考古经验，以及天生的耐心，使他对黑水城遗存文献和文物的盗运更为彻底。1914 年，斯坦因率领他的队伍自肃州至此，在黑水城内外挖掘、筛选。1917—1922 年，斯坦因获取黑水城文献以后，按照他中亚探险获得资助的比例，分别交送给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

陈寅恪先生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从 1908—1909 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柯兹洛夫考察队发现黑水城文献以后，随着材料的大量发现和西夏文的破解，西夏学开始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在经历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俄国、日本和中国的西夏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作为“西夏学”形成既晚，其研究范围和深度也仍然留存着巨大的空间，分类的专项研究许多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各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6 页。

项研究，在东西方之间，在国内和国外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其中西夏文献学就是一个总揽全局的基础性学科，同时也是尚未充分开发、尚未成熟的一个相对寂寞的领域。

一、西夏文献学研究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唐宋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和经济、科技的原因，虽然强盛一时的大唐王朝不复存在，但是，城市经济、市民社会、生产技术等，都在宋代有了质的进步。广泛开放的民族交流，在此时改变了形式，通过各民族政权之间战争与和平的方式继续进行交流，交流的形式也日趋多元性。宋、辽、夏、金、元、回鹘、吐蕃等，各自依据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军事实力，在交流中得到对自身发展的补充。

于是，印刷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书籍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书籍的内容也由于民族需求的互相补充，被翻译成各种民族文字。而西夏王朝则是最为注重中原文化的一个边地政权，不仅从中原获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的多种营养，也同样影响了中原的文化，特别是辐射了以西夏为媒介的西藏文化和西域文化。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的早期实物，但是，当时基本上还是写本时代。印刷品屈指可数，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活字印刷。而到了宋初，就有了“开宝藏”雕版大藏经的大量印行，以致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广泛使用，使得敦煌的大量破损写卷只能废弃在藏经洞中。

比如说，唐五代时期的书籍形式，主要是卷轴装形式；但在西夏文献中，则出现了许多唐代少见或者不见的样式。卷轴装大部分很自然地被改造成经折装，以便于随手翻阅任意部位的内容；同时出现了或者说普及了许多种先进实用的装帧形式，包括一些只有孤本单传而至今已经绝种的形式。

比如说,图书的内容也由于社会或者学派的发展进步有了很多的变化。敦煌本《六祖坛经》在这时被改造、分裂为多个系统,而在西夏地区则可以同时流行;禅宗学说的"五家七宗"在此时同百花齐放,佳作纷呈。显教的圆顿空有性相各自有新的诠释,而藏传密教则在抖落达摩灭佛的尘埃以后,在西夏填充了整个 10—11 世纪的佛教历史。

西夏王国是我国中世纪西北地区的强国,由于我们曾经知道的文物和史料较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夏王国仿佛彻底消失,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段空白。直到 20 世纪初,大量西夏文献的发现及西夏学的系统研究,西夏王国的神秘身影才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近二十年间,随着西夏学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黑水城西夏文献俄藏部分已在中国陆续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全部五册在 2010 年由北方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整理出版。中国中古史上被埋藏近千年、出土后又流失于海外近百年的古代文献遗存重见天日,这是当前我国史学界的一件盛举,必将有益于我国学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黑水城之所以引起国际东方学界的注意,当然起因于俄国科兹洛夫的发现。不过科兹洛夫虽然受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影响,在考古学方面显得并不专业,挖掘过程并没有计划。斯坦因所获虽以碎片为多,但因其发掘程序的严格而留给后人以可信的信息。由于斯坦因严格记录了出土地点,通过这些地点的出土文献,我们知道了某一遗址曾经是官署或者寺庙或者民居等。

斯坦因所获黑水城遗书收藏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英藏西夏文献除大量的西夏文外,还有为数可观的藏文、回鹘体蒙文等,内容广泛涉及官府文书、军法兵书、典当契约、韵类辞书、日用杂记、诗歌艺文,医学药方、星历占卜、佛教经典等,为研究西夏学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语言、文学、科技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写卷书体主要有楷书、行书、草书,装帧形式主要有卷子本、蝴蝶装、粘叶装。英藏黑水城西夏世俗文献中,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有西夏供养人题记、供养人发愿文、词咏偈语、语词音韵以及有关西夏医学、音乐、道教、历法、军事、法

律、经济、历史、官私印章、族姓、文册等资料，还有西夏僧人传记、文集等遗书，特别是还有梵、夏、藏、汉、蒙、回鹘文注音对的照残卷，极富研究价值，林林总总，粲然可观。汉文古籍西夏文译本类有《孝经序》、《孙子兵法》、《将苑》、《经史杂抄》，西夏文字典、韵书类有《文海》、《同音》、《杂字》、《五音正误传》，西夏文学作品类有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五言诗《新集碎金置掌文》。其他尚有译自汉籍的《德事要文》，僧人传记《寄照国师传》、《沙门善海奉诏集》，历书残页、医方和星占卜筮，西夏文法律文书如刊本及写本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军事法律文书如《贞观将玉镜》，以及西夏文佛经八十多种，这些佛经分别译自汉文和藏文，有些已经无法找到汉文、藏文的原本，具有独立的目录学的价值；有些则具有相互印证的校勘作用，具有重要的版本学价值，比如《诸说禅源集都序干文》和汉文《禅源诸诠集都序》、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等，正是禅学史研究相关材料业已穷尽以后的新的补充。所有佛经和相关文献的目录，对于完整勾勒西夏佛教的框架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推动西夏的学科发展、推进西夏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文献价值。

二、西夏文献学研究的现状、问题和需求

“西夏学”的历史并不很长，西夏文献学也还处在草创阶段。原因是，从 1990 年代开始，西夏文献才大规模地公布。迄今为止，这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可喜的进步，陆续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汉文部分和西夏文世俗文献部分，以及我有幸参与编纂的《英藏黑水城文献》的 1—5 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1 册，还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和包括各家散藏的《中国藏西夏文献》。但是，这些项目中许多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最终完成。就是说，作为西夏学的“材料学”阶段还没有过去，人们还是要为获取资料奔波一段时间，虽然这段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只有在全部材料基本穷尽的时候，研究工作从逻辑上说，才能得

出真正完整的结论。

俄藏黑水城文献，是柯兹洛夫 1909 年获得，以后保存在亚洲艺术博物馆(后更名为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早期由聂历山等人依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开始破译了西夏文字；此后又有克恰诺夫等专家的努力，逐步深入，开始了关于法律、军事、文学、诸子和佛教文献的全面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日本学者较早开始了和俄国的合作，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英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 1920 年代。1917—1922 年，斯坦因将黑水城所获文书材料全部转交给大英博物馆，并委托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进行整理、研究。最早是格林斯坦德对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孝经序》做过深入的研究，这是一篇西夏文草书文本，格氏的研究主要是破解西夏文草书和楷书的对应关系，对于识别大量草书文本具有启迪示范作用。1920 年，马斯伯乐在《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Henri Maspero，*Les Documents Chinois*，*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a Centrale*，The Trustees or British Museum，London，1953)中，按照敦煌、楼兰、吐鲁番、塔里木、黑水城顺序，对斯坦因所获汉文文书进行了介绍。这是一部奠基性的著作。

就个体文献的释读和研究而言，马斯伯乐对黑水城文献的介绍从 473 号到 607 号。473 号是 K.K.VI.02a 号为唐“永泰二年(766)六月日苏润国牒”，是至今发现黑水城文献中具有最早纪年的写本。此后的年代是 K.K.II.0253a 和 0270.xx.i 的契丹(辽)“天庆十一年”的 15 件典押文书等。而 479 号以下则是元代官私文书、四部书、日历、道教文献、佛教文献等，其中 K.K.II.0238k《景德传灯录》和俄藏文献 Φ.229v 同出于“著名的”大塔，当然十分值得注意。

我国对西夏文的研究，早期有罗福成、王静如等；1980 年代以来又有李范文、白滨、史金波等专家致力于此，但是苦于不能直接面对流失海外的主体原始文献，进展比较艰难。大量研究主要停留于音韵、西夏

语法、法律、诸子等个案上，还很少有从文献学视角进行研究的。现有西夏文献学的研究著作，还主要是资料的介绍和不完全的概括。一些早期的专题论著，都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准备修订。西夏文献学和它的姊妹篇敦煌文献学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敦煌文献已经出版了至少王重民、施萍婷两个总目，西夏文献则主要有俄藏《西夏佛教文献目录》，在整个西夏文献中虽然是主要的方面，但世俗文献的目录仍未整理、出版。其他目录则分散发表在各类资料出版物和研究专著中，也远远没有真正成为总目。

三、西夏文献学研究的实证要求和实践基础

西夏文献学，作为真正原创性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直接接触原件，掌握第一手资料。西夏文献学的材料不能孤立地予以评估，必然要参照现有资料，将其放在类似环境条件下进行比较，才能够正确标定其学术价值和地位。这也需要对文献学的整体背景知识的了解。幸好最近数年以来，我们从事了《英藏黑水城文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俄藏黑水城艺术品》的编纂。作为必要的基础准备，我们进行了整套已出《俄藏黑水城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同时有幸在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逐件登录了两馆所藏的全部西夏文献，对于这些主要藏家的藏品有了直接的认识。可以说，随着西夏资料的刊布，西夏文献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渐趋完备；随着我们的学习、编纂工作的深入，我们也不断有了对于此项专题的新的认识。

（一）对英、法、俄等藏品的现场调查

2004 年 4 月，笔者和同事为编纂出版《英藏黑水城文献》，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逐一记录文献的原始数据、鉴别文献的版本状况，等等。我们事先拟订了著录的义项，包括原始编号和现编号（原始编号对于分析文献的组群伴生关系十分重要，得以依此编制各个出土地点的文献索

引)、原装帧形式(包括单页、卷轴装、经摺装、梵夹装、蝴蝶装、粘叶装、残片)、尺寸(纸高、宽,纸幅,卷心或版心)、纸质(事先估计可能出现多种纸质,但实际调查结果只是各种不同样式的麻纸,差异主要表现在厚薄色泽净污等)、纸色、墨色、写刻形式(写本、刻本、活字本、绘画等)、批注印章,等等,总共 40 个左右的预选项。

我们注意到,斯坦因获取文献以后,首先对于大多数文献的进行了编号。编号的义项中包括出土地点等。此后,大英博物馆在夹存到玻璃板中去的时候,又做了新的编号。

我们在英国国家图书馆对西夏文献进行了逐件著录。即使是极其粗略地浏览,也发现了至少包括有大量钤有印章或者画有符押的"总管府"公文,1222《供养启请文》、《慈氏启请文》、《请僧文》,1224《字类》,1225《金刚经》,1243《周礼正义》,1254《俗讲》,还有 1340 很可怀疑其来源的北朝到隋代的带有隶书字体风格的写经,1341"张先生题"对联,1344《蒙求》,等等。

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甄别文献的发掘来源,查明原先不很明白如何混淆的吐鲁番文献。由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的汉文文书统一编入了 Or.8212 序列的连续编号中,而在 Or.8212 序列的胶卷中"Khara-Khoja"(新疆吐鲁番哈喇和卓)和"Khara-Khoto"(哈拉浩特,即黑水城)首字缩写"K.K."相同,"K.K."字头下同时包括了两地的收藏,这就是两地资料混淆的原因。这项甄别十分重要,诸如佉卢文、龟兹文、巴利文、婆罗米文等文献,通行于汉唐时期,只可能出现在哈喇和卓,不可能出现在黑水城中,否则对于断定黑水城建立时期将是严重误导。

我们搜集了收藏和研究情况的资料,以及发掘情况的文字记载。但如果还要进一步追溯,比如斯坦因发掘了哪些地方?斯坦因的发掘和柯兹洛夫的发掘、也就是俄藏文献和英藏文献有些什么关系?黑水城的现状包括许多文献的出土地点的现状是怎么样的?黑水城的地理状态和生态环境是怎么样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应当到文献的出土地——黑水城,对照历史资料进一步考察。

2005 年和 2006 年，为合作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艺术品》，我们两次前往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对馆藏黑水城艺术品进行了调查。俄藏黑水城艺术品和俄藏黑水城文献，是由柯兹洛夫 1909 年在黑水城同一地点同时获取的，对于相互之间的参照、印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关于《清凉国师答顺宗皇帝问》的版画和绢画，以及元昊的画像等，都是国内未见或者尚未引起注意的。我们同时还考察了从艺术品纸板夹层中剥离出来的十来件西夏文写本。这是目前未见著录的新材料。

（二）黑水城遗址的调查

2004 年 11 月，我们在研究了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在黑水城发掘情况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柯兹洛夫《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对于发掘现场的描述，以及斯坦因《亚洲腹地》中的大量地图和照片，对发掘地点再次作了考察和拍摄。根据斯坦因绘制的地图、测绘图，以及当时拍摄的照片，逐一寻找了柯兹洛夫和斯坦因的发掘遗址，并且拍摄了许多照片，进行了一些记录。其直接成果就是，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能够把斯坦因当时的地图、测绘图和遗址照片，和现在拍摄的、包括全场景的广角照片和局部细节特写对照起来，使得更多的人了解黑水城，了解黑水城的不同时代和命运。对于遗址在将近百年中的侵蚀变化，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从斯坦因和我们现在的照片对比中可以看到，柯兹洛夫发掘以后的“著名的”大塔，还剩下了塔身和塔基，斯坦因到达的时候，这个被定为“K.K.II”的遗址，还尚存柯兹洛夫发掘遗留的雕塑残片；而经过斯坦因再次发掘以后直到现在，已经掘地六尺，清理到了塔基以下。令人惊讶的是斯坦因竟然还能够在柯兹洛夫发掘的同一地点获得极为丰富的文献。而记录为“K.K.I.i”的寺庙遗址，斯坦因提供的是从台座到高墙的完整照片和测绘图，而现在只有高墙的顶端还孤独地矗立在流沙之上，以下完全被掩埋了；而 2006 年 7 月“黑水城历史与环境国际学术会议”中再次前往考察时，发现其西墙又有大面积的倒塌。这次考察，使我们进一步确认了《英藏黑水城文献》相关文献的具

体出土地点，对这些地点的性质和文献族群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也就形成了本书力图说明俄、英、法、国图、敦煌研究院各部收藏的相互关系，以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的精确遗址。

四、本书的创新价值体现

（一）首次提出了西夏文献分为三部分的定义

为了澄清西夏文文献、西夏时期文献、黑水城文献的交叉和混淆，本书重新界定了西夏文献分成党项前期、西夏时期和后西夏（包括元明）等三个时期；它们总属于西夏文化的宏观范畴，又分别处于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党项前期，主要是汉文和藏文史书的记载；西夏时期，是西夏文献盛行的主要时期，如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大部分，宁夏、甘肃不少遗址出土的文献；后西夏时期，是蒙古—元—明时期，主要是西夏遗民继续使用西夏文撰写刊刻的文献，如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元代文献、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元代文献、宁夏灵武城墙下出土文献、杭州大万寿寺刊印“河西字大藏经”等。三个时期的区分，避免了笼统地将元代、明代的西夏文文献指称为西夏时期文献的错误，这对于各地出土文献的不同的年代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避免由于断代不清而引起的史料混乱。

（二）首次清理和阐述了各大收藏之间的关系

和时代问题相关的是出土地点问题，本书阐述了分别出土于黑水城和敦煌的俄、英、法等特藏以及内蒙古考古队、敦煌研究院发掘之间的交叉关系，说明其源流和现状；考证清楚文献出土的不同地点、不同年代，是正确使用这些资料的关键问题。对于柯兹洛夫、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的探险发掘活动，并不是孤立地介绍，而是作为介绍各部收藏相互关系的关键细节来进行的分析。这样有助于对于某些文献发掘背景和相互关系的了解，也容易依此寻求相互联系乃至缀合、比定的可能性。比如，伯希和、奥登堡、敦煌研究院都在莫高窟北区同一地点进

行了发掘，柯兹洛夫、斯坦因、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内蒙古阿拉善盟文管所都在黑水城这同一地点进行了发掘，这些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文献原来都有共同的血缘关系。关于各个考察队发掘情况相互联系的研究，将有利于对出土文献相关性的研究。我在英国记录了斯坦因发掘编号和馆藏编号的对照表，据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部主任吴芳思先生告知，这是斯坦因藏品入藏以来第一次按照出土地点对文献进行了归属。反映在本书中，就是以斯坦因在黑水城“K.K.II”遗址即俄国科兹洛夫考察队“著名的大塔”出土文献为例，首次明确了这个遗址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献，为这个仅次于敦煌藏经洞的重要遗址的断代和深入研究，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在此以前，学术界无法知道从这座佛塔出土了哪些文献，也就无法对这座塔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进行研究。

（三）首次著录了英国斯坦因编号和法国藏品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黑水城文献 4000 多号，7000 多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西夏文文献 250 多件。这些材料从来没有编目，尤其是斯坦因在发掘现场的登记编号，记录在每一个残片上，从来没有进行登录，也无从和现有馆藏号对应，使得阅读早期研究著作和检索原件十分困难。尤其因为馆藏号是藏架编号，割裂了对于某一遗址的依存关系，对于整体把握和理解某一遗址出土文献，几乎没有可能。在本书中首次刊布的部分遗址目录，我们仔细辨认了相互接近的材质和形式甚至内容，某一玻璃板中常常夹存同一类型的残片，写本、刻印本、活字本被分别归属，而它们却常常是从不同的发掘地获得的。我们十分惊讶他们对于活字本的鉴别能力，现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活字本，早在夹存入玻璃板以前，已经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合理的归类。

（四）首次对某些文献进行了鉴别和考证

因为有接触实物的机会，对于某些具有争议的文献有可能进行仔细鉴别，也就义不容辞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说明，譬如对于法藏《华严经》真伪的问题进行考证；特别是对于雕版印本、活字印本、泥活字印本，离开实物、依据照片很难进行鉴别。我在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亲手验证

了每一个残片，对于每个残片，我们都通过变换视角、正反核对来检查其版本情况。所有的结论都将在今后正式出版物《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中作为附录发表。本书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也例举了一些代表性的图版，将有助于推动西夏文献印刷史的研究。

（五）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了西夏佛教的主流倾向

汉传佛教主要是华严宗、禅宗和净土宗，藏传佛教主要是上乐金刚、时轮金刚和大黑天信仰。这方面的材料除了反映在黑水城出土的大量文献（已经在分类的《总目》和《译自藏文的佛教文献》的列表证明），也反映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西夏唐卡之中。藏有黑水城绢画“清凉国师答顺宗皇帝问”，和文献中的同题版画一样，非常突出华严四祖澄观的地位；同时拥有很多件华严五祖宗密的著作，尤其是多件西夏文本《禅源诸诠集都序》。本书从文献实物出发，研究了西夏佛教教派具有禅教多元融合的特点。比较研究了西夏流行的两种《六祖坛经》和敦煌本、惠昕本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在西夏佛教中，并非如学术界目前普遍认定的和敦煌本完全一致的观点，而得出多元的、各本并行的结论。既有案头读本，也有宣讲用的简本。

在众多文献中，最引人注目的样式当属血书和版画。血书一般为高僧以自身鲜血和墨写成。以血掺入写经，非对佛祖至为虔信不能办到。血书甚为金贵，一部血书即可为一寺院镇寺之宝。我们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亲眼看到了这些令人震惊的经书，假如是通过印刷品来观察，根本就无法辨别出血书文本来。第 3502（K.K.V.b.019.j-I）号和第 3551（K.K.V.b.015.p）号西夏文献，写本，色浅，血书，用纸细白。不知这些血书出自何人之手，也不知书写血书的人是为了己身的超度还是为了警示世人。由这一行行渗透着一个人鲜血的经文，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世间一种强大的祈盼。

相比之下，版画给人的感受更轻松愉悦。当佛经编纂和流通进入刻本时代，也就是宋—西夏时代以后，刻本中的绘画就体现为雕版印刷

的最早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夏版画除了在工艺上的创新以外，在形式和独立的表现语言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西夏文献中的佛教版画，不仅数量较多，可以说是早期版画的最集中的体现，而且水平很高，具有多样的高级形态的样式，可以说是继轨大唐、开启宋元。其特点主要是增强了叙事性，壁画题材反映的佛经故事比如观世音救难故事、普贤行愿品的十个情节描述、西夏译经图的场面叙述等，都直接采用了各种生活场面；其次是具有很强的人物写实能力，描画对象从佛菩萨扩展到供养人和被接引者，就有了更多的不受佛像制作的限制；在谋篇布局和刀法运用上更加成熟，有时非常恰当地运用了阴刻和阳刻的对比。

（六）本书的特点是实证的调查记录

本书从纸张纸质、印刷术（包括雕版、木活字、泥活字）、版本鉴别、版画、装帧形式，以及皇帝、皇后、官员、僧人、供养人、管主八题记等的六个方面，研究了西夏文献版本学的特点。作为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到原件的中国人，我有责任将文献的原始情况介绍给学术界；同时也充分利用现场鉴别的有利条件，甄别出早期线装本、木活字本、泥活字本等重要书籍史资料；充分利用从皇帝到僧人、供养人等刻经题跋，反映西夏一代的佛教活动；新发现的法藏“管主八题记”，补充了元代杭州路大万寿寺刊刻“河西字大藏经”的历史资料。

当然我们最先着手的是辨析这些的文献最直观的体式，其中之一便是装帧。装帧看似只是简单，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讯息。不同的装帧体式体现着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的阅读要求和阅读习惯。装帧形式的剧烈变化期，是在唐宋之间。从现存敦煌写本来说，已经具备了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摺装、粘页装、蝴蝶装、线装的各种形式。但是，由于写本占据的绝对地位，从简帛形式导致的卷轴装，从贝叶形式导致的梵夹装，从卷轴装演变的经摺装，从卷轴装演变的龙鳞装，始终是主要的形式。由于印刷术的发明，雕版所用木板规格的限制，经摺装、蝴蝶装、粘页装和方册线装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对于所

有这些装帧形式，法国的戴仁先生和中国的方广锠先生都有完整细致的叙说。而各种装帧形式（除龙鳞装以外）在英国的藏品中都有了比较完整的体现，甚至还出现了一种至今没有命名的装帧形式。在雕版刻本和写本之外，我们看到了许多活字版本。活字版本是应文化繁荣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是当时西夏王朝教育普及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

（七）首次比较完整地梳理了西夏文献的总目

本书并以俄、英、法和国内外藏品为基础，博采各家目录，编纂了《英藏黑水城文献要目》、《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全目》、《六祖坛经各本对照表》、《译自汉文的文献表》、《译自藏文的文献表》、《K.K.II 出土文献简表》等，以及《西夏文献总目初编》。这些列表投入了整理、比较、归类的最为繁复的劳动。有些是完全新创，比如《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全目》、《坛经表》；有些是在借鉴整理前人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了分类，比如《译自汉文……》和《译自藏文……》的图表，在西田龙雄的表中并没有分别提取，我对它们按照确定“译自”（已经找到大藏经中对应文本）和推测“或译自”（还未找到对应文本）进行了归属。又如《总目初编》，是以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为基础的，但是该目并没有进行分类，不能反映在西夏时期流行佛教文献各部类的情况——没有包括汉文文献，没有包括世俗文献，没有包括其他馆藏。我按照国际通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分类结构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以及敦煌文献分类法对其进行了分类的排比，可以使人十分方便地了解某些部类比较盛行或者相反。我补充了汉文文献、世俗文献和国内外已经发表的目录，使之比较完整，比较易于使用。

本书试图编撰的《西夏文献总目初编》，姑且只敢称之为“初编”，是初步的意思。这一初步，也是站在了前人的基础上，只不过把自己工作中正在进行的英国、法国的目录、其他藏馆的目录、非佛教文献的目录充实进去而已。不管怎样，这样的能够全面反映西夏文献面目的目录，也毕竟是总算有人做了，并且期望在此基础上，能够最终形成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总目。